

20 世纪中国的编辑学研究

一、编辑学的萌发

中国是世界上著名的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文化昌盛，典籍浩繁。有史以来，可以统计的出书品种，已超过 200 万种。编辑活动的历史，源远流长，殷墟出土的甲骨中就有“编”字。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称：“编，次简也。”可见，编辑活动在“有典有册”的殷商时期，就已经萌发。从古代孔子、吕不韦、刘向父子，到近现代张元济、鲁迅、邹韬奋、叶圣陶、王云五，编书的人历代都有。正是他们为创造和发展中国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为全人类文明进步写下了灿烂的篇章。同时，也为我们留下了编辑活动的丰富经验和优良传统。他们在编辑实践中提出的思想见解，制订的编辑体例，形成的工作方法，是今天人们研究编辑学的思想渊源和有价值的资料。

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革，文化的演变，媒体的更迭，必将对精神生产和媒体制作提出新的要求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体制和规章，并将在编辑活动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方法上表现出来，编辑活动的理论和实践，将会有所变革，有所创新，也

为编辑学的研究提供新的契机。

19 世纪下半叶和 20 世纪初逐步形成的近现代中国新闻出版业，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跌宕起伏。20 世纪初至 40 年代，各种思潮，云涌而起，社会处在大变革的前夜，作为当时最敏感的文字媒体——报纸，首先有一个如何适应变化着的形势的问题。报纸如何办、如何编？不能不成为业界深为关切、亟待妥善处理的问题。当时已有 8 所大学开办新闻学系，在校学生逾千，至于新闻专科学校和各种培训机构则更多。有教育就需要教材，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第一本编辑学著作——《编辑学》应运而生。它由广州自由出版社出版，时间是 1949 年 3 月，作者李次民，是广东国民大学新闻系教授，有多年新闻实践和讲授新闻学的经验。他在 1947 年根据当时的社会需要，讲授编辑学，两年后在讲稿基础上，经修改充实后出书。这本书的内容，主要讲报纸编辑学，不仅有具体操作性问题，而且有一定的理论色彩，是一本实用性比较强的教材性读物。其中设专章讲了杂志编辑工作，凡二十二章，20 万字。作者认为：一张报纸的好坏，其先决条件，在于主编者学养与编辑艺术，他在这本书的《初版自序》中说，新闻编辑“不是单靠个人有学问就能做到的，这正如萨空了先生在其《科学的新闻学概论》里所说：‘编辑新闻，决不是任何知识分子，都能胜任的’。这也就是说，做编辑的人员，必须明了编辑的重要及其作用。”

这本书很可能是世界上第一次把文字编辑工作作为一门学问来加以讨论，从而把它引上学术之路，并且创造了“编辑学”这个名词。

编辑学这个名词，所以能第一次在中国出现，首先是因为中国有极为悠久、而且连绵不绝的文字工作传统；其次是中国自古以来积累有无比丰富的典籍，它们之所以能够传世，与历

史上出现诸如诸子百家，学术争鸣的风气，从而造就一批学人，自觉不自觉地在那里收集整理材料、润色修改、编纂书籍分不开；再次是中国的统治者，自古以来都有修志编典的传统，不论他们的动机是出于维护统治、美化自己，或者是排斥异己，但是在客观上他们都程度不同地肯定了编纂编修编集这种工作的重要性。

50年代到60年代，我国北京、香港、台湾都有编辑学著作出版，首先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把当时苏联专家К·И·倍林斯基教授在人民大学向学生讲授的“书刊编辑课大纲”的讲稿，编成《书刊编辑学教学大纲》一书，于1956年正式出版。目的也在于适应当时该校编辑出版专业的教学需要。内容主要讲各门类书刊编辑工作的原则和方法以及强调“书刊编辑学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拟定的关于出版社内书籍和杂志的主要创造过程的一套理论”。指出“编辑是担负党和国家在思想战线上一项重要任务的政治文化工作人员”。这本书的内容，虽然也涉及刊物的编辑工作，但主要是讲书籍的编辑工作，特别重视书籍的编辑指导思想和编辑人员的立场、观点、方法以及政治和文化、出版的关系方面等问题。它为社会主义书刊编辑工作指明理论方向，对后来的编辑学研究有重要影响。

1965年，香港的海天书楼出版了余也鲁的《杂志编辑学》，作者是一位资深编辑。全书主要讲杂志编辑工作的意义、作用和方法，尤重操作，有较强的实用性。多年来，几次修订再版。90年代，又补充了电脑编辑等章节，累计印数以数万计，主要在东南亚发行。

二、编辑学的崛起

70年代末，经过拨乱反正，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教育科技、文化艺术事业，陆续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特别是新闻出版事业的飞速发展，编辑工作自然而然地得到了重视，它作为整个出版工作的中心环节，尤为突显。因此研究编辑学的问题，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80年代初，一些资深编辑如陈仲雍、倪子明、萧月生等在报刊上发表了《科学地编辑与编辑的科学》、《需要一部编辑学》等文章，认为数万名编辑人员“很需要一套切合实际的编辑学”，研究编辑学已是“当务之急”，并且提出建立图书编辑学、报纸编辑学、杂志编辑学。认为：“百科全书编辑学、辞书编辑学、儿童读物编辑学……有共性又有个性，彼此都有不同的特点。”

1983年，我国著名理论家胡乔木致函教育部，要求在几个高等学校试办编辑学专业，指出“编辑之为学，非一般基础课学得好即能胜任。”认为在我国编写编辑学这类书是有基础的。他说：“在历史上，我国著名典籍的编辑经验，也有不少记载，不过需要收集整理”，贵“在有心人的努力罢了”。同年，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一次讲话中也强调“编辑工作是一门科学”要研究它的规律，“创造出一门马克思主义的编辑学”。著名科学家裴丽生也支持研究编辑学。这些都是对编辑学研究的推动与促进。

同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了《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建立出版发行研究所……加强出版、印

刷、发行的研究工作”。1984年，中国出版发行科学研究所正式筹建。这个研究所十分重视编辑学的研究，立即着手组织图书编辑学、期刊编辑学和科技书籍编辑学的研究和编写工作。仅在建所后的第一个10年就出版了编辑工作和编辑学方面的书近10本。

1986年，国家出版局正式批准成立了两个出版类专业书籍出版社，即中国出版发行科学研究所的中国书籍出版社和山西省的书海出版社。

1986年到1987年，上海市编辑学会和专业性的中国科学技术期刊编辑学会先后获准成立。这是我国两个最早成立的编辑方面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学术团体。

接着，山西人民出版社创办了《编辑之友》杂志，上述两个学会又先后创办了《编辑学刊》和《编辑学报》。《出版发行研究》杂志和以后创办的《新闻出版报》和《中国出版》杂志，也经常发表编辑工作与编辑学方面的文章，一些刊物和报纸，还专门开辟了研究编辑实践和编辑理论方面的文章专栏。

这些机构、组织的成立，有力地推进了编辑学研究的开展；这些理论传播、学术阵地的创办，大大促进了编辑学研究的发展。

据统计，80年代，共出版以编辑学命名的著作9本（不包括内部印行、系统发行的讲义和参考资料等），其中有两本即《现代杂志编辑》和《新闻编辑学》是台湾出版的^①。

这批书中，比较有影响的著作有：郑兴东等编著的《报纸编辑学》，阙道隆主编的《实用编辑学》，高斯、洪帆主编的《图书编辑学概论》张玟、林克勤著的《书籍编辑学简论》王

台湾出版的编辑学著作，收集不全，以见到的为准。

耀先主编的《科技编辑学概论》，王振铎、司锡明主编的《编辑学通论》等；论文集有：中国出版发行科学研究所科研处编的《编辑学论集》，刘光裕、王华良的《编辑学论稿》等。

在这 10 年中，发表的编辑学方面的论文好几百篇。比较有影响的有：戴文葆的《编辑与编辑学》，林穗芳的《关于图书编辑学的性质和研究对象》，胡光清的《编辑学研究什么》等。

在这 10 年中，编辑方面有影响的著作还有：边春光主编的《编辑实用百科全书》。此书 170 万字，是一本理论性、实用性、资料性兼具的专业性百科全书，是我国编辑经验的科学总结，是编辑实践的理论升华，对编辑学的学科建设作了重要的奠基性的工作，是我国有史以来编辑工作方面的一本重要著作。

《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和《出版词典》对编辑工作与编辑学也作了精辟的论述和充分的阐释。它们使编辑学在科学之林占有一席之地。《中国出版百科全书》也有一些编辑学和编辑理论方面的条目。

在这 10 年中，在编辑业务、编辑人物、编辑历史、编辑传统的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有影响的著作有：曾彦修、张惠卿等著《编辑工作二十讲》、戴文葆等著《编辑工作基础知识》、金常政等著《百科全书及其编辑研究》、赵家璧著《编辑忆旧》、韦君宜著《老编辑手记》、杨牧之著《编辑艺术》、钱君匋著《书衣集》、韩仲民著《中国书籍编纂史稿》、陈原等编纂《商务印书馆大事记》、赵家璧著《编辑生涯忆鲁迅》、钱小柏、雷君明编著《韬奋与出版》、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科研办编《近现代中国出版优良传统研究》、伍杰著《中国古代编辑家小传》等。

此外，有的研究者还对编辑学作了跨学科的研究，写出了《编辑出版学》、《编辑社会学》、《编辑心理学》、《编辑思维学》

和《编辑写作学》等。

以上这些书籍的出版，既是编辑学学科建设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又为编辑学研究提出了思路，揭示了历史和现实的经验，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大大促进了编辑学的理论研究。

80年代是编辑学研究的起步时期，这些著述都是开创性的。一般采取总结实践经验，升华为理论的方法；内容涉及到编辑学学科建设中的方方面面，从概念、原理、规律到方法论等方面的问题，都已经提出，展开了初步的争鸣，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作为一门新的学科，有一种很好的造势。

三、编辑学研究的逐步深化

90年代，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中国经济得到了新的增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这些都为出版发展提供了新的活力，创造了极好的机遇，同时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因而也给出版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作为整个出版工作中心环节的编辑工作，如何在新形势下，把握契机，健康发展，并且创造新的经验，丰富编辑学的理论宝库，进而指导编辑实践，不仅是实际工作的需要，也是编辑学学科建设本身的要求。新的形势要求编辑学研究向纵深发展，既需要以80年代大家比较关心的书刊编辑学研究为基础，又要面对各门类、各层次、多种媒体编辑工作的需要；既要回答实际工作中提出的问题，又要研究理论体系的构建。面对这样的任务，迫切要求编辑学研究更要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

1992年，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全国性群众性学术团体——中国编辑学会的成立正是适应这种形势的需要。

中国编辑学会的成立，使编辑学研究有了一个专门地谋划和组织的枢纽，有助于编辑学研究者之间的联系，有利于编辑学研究的开展。

学会成立之后，首先是明确了编辑学研究的方针，这就是：编辑学研究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遵照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出版方针，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开展编辑理论和编辑实践的研究，促进出版繁荣，更好地为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

理论联系实际，是一切理论研究的根本方针，也是编辑学研究的根本方针。我国的编辑学研究，从 80 年代兴起以来，一直是贯彻执行这个方针的。进入 90 年代以后，特别是学会成立以后，这个根本方针得到了进一步的明确和坚持。编辑学研究必须联系实际，这个实际主要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编辑工作中的一些重大原则问题和实际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兴起以来，编辑工作要不要适应市场经济和如何适应市场经济；出版社由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编辑工作如何既按照精神生产规律办事，又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既明确图书是精神产品，又看到图书是商品，但不能搞精神产品商品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既要认识市场、流通对编辑工作的重要意义，又要坚持编辑工作是整个出版工作的中心环节，那种认为编辑工作中心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已经“过时”的看法是片面的，不符合实际的；既要承认市场对出版的推动，出书要面向市场，又要强调面向市场不是迎合市场，而要引导市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既要强调出书对路，编辑工作必须大胆探索，积极创新，又要坚持编辑工作的基本规范和基本要求；既要重视编辑策划的重要作用，又要强调审稿、加工修改等在新条件下的特殊重要意义；

既要强调编辑的主体地位和能动作用，又要强调爱岗敬业，遵纪守法，恪守编辑的职业道德。能不能紧密结合当前实际正确处理好这些问题，对于编辑学研究的深化和编辑学学科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学术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编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贯彻“双百”方针，在区别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两种世界观的问题的前提下，要坚持学术民主和不同观点的自由讨论。10多年来，编辑学研究所以发展比较快，而且在不少问题上已经形成了几种不同的观点，这是和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坚持贯彻“双百”方针分不开的，也是今后需要继续坚持的。1994年1月，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精神产品的生产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劳动，需要专家、学者和文艺工作者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我们应该尊重和爱护他们的辛勤劳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双百’方针，努力形成一种鼓励探索与创造的良好环境和气氛，在学术研究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①编辑学是一门新兴学科，正在发展形成的过程中，要真正成为一门具有现代科学形态的独立学科，仅仅靠少数几个人是不行的，必须认真贯彻执行“双百”方针，集思广益，集腋成裘，使编辑学的学科建设日臻完善。

团结各方面的积极分子，建立和扩大编辑学研究的骨干队伍。编辑学是一门正在兴起的学科，它的研究队伍的形成，必须从实际出发，并在实践中形成。编辑工作是一种政治性、思想性、科学性、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又是艰苦细致的创造性劳

见《人民日报》1994年3月7日。

动。编辑工作的这种性质，决定了编辑学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学科，它萌发于编辑工作的实践，首先在一些善于对自己的工作进行理性思考的热心人那里脱颖而出。编辑学来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它离不开实践作为基础，这是不奇怪的。但是，另一方面，编辑工作者既是出版物的设计者，又是生产者，特别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出好适合读者需要的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他们不太可能有足够的时间，把编辑工作作为一门学问来进行周密的思考，除非他们在一段时间里离开实际工作岗位。这种状况，虽不是一种定律，但对大多数人来说确实是难以超越的。因此，编辑学的学科建设，必经找到另外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在哪里，又如何使它和编辑实际工作者紧密地结合起来，这是编辑学研究开始起步时的一个突出问题。到了 90 年代，这个问题才得到了比较好的解决。也就是把编辑出版界的研究力量和高等学校的编辑研究力量，首先是高等学校编辑学专业的教研力量，紧密地结合起来。使注重理论的人看到实践的需要，了解编辑工作的实际情况；使从事和注重实践的人，进一步掌握各种各样的理性思维，获得新的启迪。这两方面的人，通过一定的会议，按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交流观点，讨论学术问题，畅所欲言，取长补短，不断完善自己的学术思路 and 理论体系，对编辑学研究有很大的推动。

出版界和高等学校两支研究力量的结合，既协调了编辑学研究队伍的人员结构、知识与经验的结构，并且大大扩大了研究队伍，也使双方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是应该肯定的。今后应该进一步坚持和加强这种结合。

出版是一种多学科多层次的精神生产部门，它的出版物五花八门，涉及各个领域，这就决定了编辑工作的多样性。图书、

期刊、美术、影视和电子出版等，它们的编辑工作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各门类视听读物的编辑人员，又各有所长。所以，编辑学研究必须协调各门类出版物的编辑工作。从图书领域来说，特别是社会科学读物和科技读物编辑之间协调，把两方面的力量结合起来，是搞好图书编辑学研究的重要条件。这种结合，现在越来越被人们所认同，并且开始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今后要进一步加强协调，使这种结合更加有计划地进行。

90年代编辑学研究队伍的再一个特点，是注意老中青结合。编辑学研究真正起步的时间不算长，最多也不过20年。所以，它的参与者，科班出身的几乎没有，大都是在实际工作中苦干了三二十年、三四十年的人，有的还是在即将离退休的时候才搭上这班车的。这里的原因，首先是工作忙，天天干实际工作，没有时间从理论上来加以思考；更重要的是不苦干多少年，也没有那么多经验可以总结。所以，一些老同志参与进来，是正常现象。问题是必须同时有中青年参加。这就要强调老中青结合，经常发现和培养中青年苗子。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保证后继有人；另一方面，是因为青年人接受新鲜事物快，思想活跃，勇于创造，开拓进取。这种敢闯敢干的精神和科学思维，正是编辑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所必需。

这三个结合，是学术研究的实际需要，也是90年代编辑学研究的重要特点，是带有战略性的。在学术发展中，尽管程度不同，但总的说来，在指导思想上应该说是越来越明确，越来越重视，其中有的是做得相当好的，总的看是很成功的。正是坚持了这三个结合，使得编辑学的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学术成果不断涌现，研究水平不断提高，学科建设不断前进。

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积极吸收国外的先进经验和优秀成果，

同时把编辑学推向世界，使它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是中国编辑学界的国际义务。

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的编辑学研究者，曾经不止一次地出访过日本、韩国，也访问过菲律宾和尼泊尔，参加过一些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扩大了眼界，了解了国外的研究情况、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和研究成果，翻译出版了国外的一些专业著作，如苏联的《编辑工作的原理与方法》，美国的《编者与作者之间——萨克斯·康明斯的编辑艺术》，美国的《图书出版的艺术和科学》、《出版学概说》、《出版概论》苏联的《八十五次喜与忧——一个编辑的思考》日本的《简明出版百科词典》、《现代出版学》、《在社会环境下的图书出版》和英国的《外国出版史》等，有利于中国编辑工作和编辑学研究的开展。同时，也邀请日本、韩国等国的学者来中国讲学，交流研究成果，并且召开过有近10个国家和地区、80余位中外学者参加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广泛地探讨促进出版发展的有效途径和方法，交流未来出版发展前景的思考，涉及到出版发展的许多深层次的问题，开阔了中国学者的思路。

由于编辑学发源于中国，所以中国的编辑学者，无论是出访，或者赴国外参加国际学术活动，或者接待外国学者来华访问、出席有关会议，都向他们介绍编辑学的研究状况，阐明编辑学的基本问题，得到国外同行的赞赏。他们认为：编辑学所以能在中国兴起，是和中国有悠久的文字工作传统分不开的。国外有的报纸，还专门介绍了中国的编辑学研究。同时，一些中国学者、专家的著作，也被译成外文，在国外出版发表。这说明，编辑学正在走向世界。

据统计 在90年代迄止1997年底)已出版以编辑学命名的图书40本。这些书籍中比较有影响的是：钱伯诚主编的

《图书编辑学概论》 向新阳著的《编辑学概论》 阙道隆等著
《书籍编辑学概论》 徐柏容著的《期刊编辑学概论》 钟立言的
《新闻编辑学研究》 庞家驹著的《科技书籍编辑学教程》 司有
和著的《科技编辑学通论》，王振铎、赵运通著的《编辑学原理
论》，刘光裕、王华良著的《编辑学理论研究》，顾荣佳著的
《编辑学的文化思考》等。

这批著述的特点是：一般都是在 80 年代编辑学研究的基础
上写成的。如果说，80 年代的著述是拓荒之作的话，那么， 90
年代的著述是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 80 年代的研究成果的作品。
有的作者是在 80 年代出书以后，90 年代重新写的；有的作品是
80 年代著述的修订或增订本；有的则是总结 80 年代学术研究的
经验而写成的。所以，在研究深度上和成果积累上有一定的
进步，也是在学科建设上迈出的重要一步。它为 21 世纪的编辑
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出了进一步研究的课题，指明了
继续前进的道路。

四、20 年来编辑学研究之轨迹

从 80 年代初到本世纪末，大体上 20 年时间，编辑学研究
走过了从小到大、从萌发到崛起的道路，也是任何一门新兴学
科产生发展的必经之路。在这段时间里，讨论过的问题不少，具
体有：

（一）关于编辑有学无学的争论

编辑学提出之初，首先碰到的是有学无学之争。有人认为，
编辑是术不是学，“编辑工作几千年来，世代相传，都是师父教
徒弟，编辑之学，未尝闻也；有的说，编辑编辑，剪剪贴贴，充

其量是个编书匠，从未想过要往学术上靠；也有的说，当编辑的只要有基本知识，有一定文字功夫，就可以编书，何必要讲什么编辑学；更有甚者，认为多少年来，没有编辑学，书也编了，而且编得不错，现在来讲什么编辑学，是多此一举”。总之，认为编辑无学，或者说可有可无。以上这些看法，经编辑界一些有识之士的分析，归结为三点：一是认为这是一种传统的旧观念，认为过去没有的东西，现在也不用有；二是认为出于对编辑工作的作用缺乏全面的理解，看成只是剪剪贴贴、改改标点符号、批批大小字号，看不到编辑的重要作用，看不到编辑学问之所在；三是认为出于某些编辑人员的自谦。相反，许多认为编辑有学的人认为：编辑工作，世代相传，都是师父教徒弟，正是说明其中有许多经验，只是过去没有去总结整理，使之条理化、系统化，所以没有形成一种学说。而所有的理论，都是从实践中来，只要认真总结，把经验上升为理论，说明编辑学的形成是有实践基础的。有的认为，中国历史上典籍浩如烟海，有的相传多少年，都是靠编辑工作才得以流传下来，其中难道没有规律可循？更有的说，从历史到现实，为什么有的书编得好，有的书编得不好，这就说明编辑工作大有学问。根据以上的争论，著名理论家胡乔木和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等明确指出：编辑有学。加上《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实用百科全书》和《社会科学学科辞典》等一些有影响的工具书，都把编辑学作为特大专条加以阐释，以及一些资深编辑纷纷撰文著书，才使编辑无学的观点，开始得到了抑制趋向沉默。但是，这个问题的逐步解决，还是在许多编辑学著作陆续问世以后。同时，我们应该清醒地懂得，抑制或沉默并不等于问题的解决，编辑无学观点的彻底解决，还有待具有现代科学形态的编辑学的真正建成。

（二）编辑学的性质

既然编辑有学，那么编辑学应该研究什么？它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它的任务是什么？这是编辑有学无学争论之后提出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同样有几种不同的观点，争论是相当激烈的。当时，提出的见解，大体上有这样一些：

1. “综合性学科”说。认为编辑学是一种综合性学科。具体的观点是：诸凡一切依赖载体获得传播的视听工具，都离不开编辑活动。所以，编辑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有的说，编辑学的综合性表现在两方面。就内涵而言，包括书、报、刊、图片等出版物和音像制品的编写、加工、整理和设计；就外延而言，主要涉及各种学科的知识，诸如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文学艺术等各个专业领域，还涉及到目录、校勘、版本等文化史范围，因而不能不是综合性的学科。

2. “边缘学科”说。认为编辑学是一门边缘学科。具体的观点是：所谓边缘学科，是指它是由几个学科互相交叉、渗透而在边缘地带形成的一门学科。编辑学研究要涉及编辑管理，编辑与社会联系，编辑的人才设计，编辑的文字功底，以及编辑、作者、读者的心理研究等等，必然会联系到管理学、社会学、人才学、写作学以及心理学等学科。这些学科各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都不能代替编辑学的研究。就编辑学而言，它也不属于上述任何一门学科，而是与这些学科相互交叉、渗透。它是在这些学科的边缘地带形成的，所以是边缘学科。也有人因此而把编辑学看成是交叉学科。

3. “杂学”说。主张编辑学是一门杂学。认为：既然编辑有时被人称为杂家，那么据以为成家的学科应该称之为杂学。

4. “综合性边缘学科”说。认为编辑学既具有综合性，又是一种边缘学科，所以称之为“综合性边缘学科”。具体观点是

编辑活动是人类社会最普遍的文化活动之一。在人类社会，凡是有文字、音像传播的地方都离不开编辑活动。而且任何一门学科、任何一类视听出版物，都有编辑活动，都有自己的客观规律，因而它就兼具有综合性和边缘性的学科特点。也有人认为：编辑学要研究各种出版物的编辑特征、规律和方法，是一门综合性多科性的边缘学科。或曰：属于综合性、边缘性的交叉学科，是软科学。

5. “基础学科”说。认为：编辑学的任务主要不在于对诸多编辑现象和编辑方法的直观说明与描述，也不在于编辑经验的一般总结，而是要探索和揭示编辑活动的本质规律，建立完整的适用于各种学科的编辑学的科学体系，所以它应属于基础理论学科。或曰：编辑学是对编辑活动中的道德、心理、法律、教育、人才、语言、美学等方面的问题，独立进行综合研究的一门基础学科。

6. “理论学科与应用学科二重性学科”说。认为：编辑学既要研究编辑活动的发生、发展及其互相联系的特殊规律等理论层面的内容，又要研究编辑工作的技能、工艺和程序控制等带有很强实际应用色彩的内容。编辑实践对编辑学研究的这种二重规定与要求，就决定了它是一门理论学科与应用学科辩证统一的二重性学科。持这种观点者进一步认为，“编辑”既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又是一种系统工程，要求以它为对象的编辑学必然是具有两重性的：既有抽象色彩的文化理论，又有对实际编辑工作的具有直接指导与控制意义的应用科学。还认为，编辑学研究的对象的组成也是双重的，即主体和客体，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制约。这都反映了理论和应用的并存与并重。

有的则从另一角度来阐明编辑学是理论性和应用性的结合。认为：研究编辑劳动的一般规律属于理论部分，研究各种

媒体编辑工作的特殊规律和方法是属于应用部分。由此得出编辑学是理论性与应用性相结合的学科。

7. “应用学科”说。认为：编辑学以编辑业务为主要研究对象，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应用学科。或曰，编辑学直接为各学科的成书服务，是应用性很强的应用学科，但不是一种单纯的应用技术，也不是其它学科所能代替或包容的。也有人认为编辑学是一门既有理论的探讨，也有实践技能的培养，而以致用为主要目的的学科，所以是应用学科。

还有的认为：编辑学同其他应用学科一样，具有规定性和描写性两个方面。规定性指有关编辑工作的规范和惯例，就是已被模式化了的那一部分编辑工作经验。描写性包括客观地描写实际的编辑过程，揭示在这一过程中客观存在的规律，对处理各种问题提供一般原则的指导。编辑学以描写性为主，规定性为辅。每一本书的情况都不一样，解决问题主要靠学识，靠掌握规律，发挥创造性，不能指望编辑学对每一种书籍的毛病都开出现成的“处方”。编辑工作需要对症下药，实用性极强，所以是应用学科。

综合以上各种观点，编辑学的学科性质问题，显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它关系到编辑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在整个学科体系中，应该如何定位，这是编辑学学科建设中的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上述 7 种观点 大都是在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初期提出来的，此后对编辑学学科性质的问题，又有过一些专门的讨论，取得了一定的共识。

总的说来，上述观点中的前 4 种，即“综合性学科”说、“边缘学科”说、“杂学”说和“综合性边缘学科”说，基本的理由是：编辑活动要涉及各种出版物（包括音像制品），它研究